

## 2003—2008 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士论文题目及内容简介(下)

李 永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四)2006 届中国古代史博士论文共 16 篇,其中先秦史 5 篇,两汉魏晋南北朝史 4 篇,隋唐五代史 4 篇,明清史 3 篇。

先秦史:韩江苏《殷墟花东 H3 卜辞主人“子”研究》(导师:晁福林教授)主要探讨了殷墟花东 H3 卜辞主人“子”的身份问题。该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讨论了决定“子”身份的祖甲、祖乙和妣庚的身份。第二章论证了“子”为武丁亲子的观点。第三章论述了“子”为太子的观点。第四章论述了商代太子的职责和权利,认为太子有与商王相对的官僚系统,有与王室密切的经济关系;太子代王主持祭祀及巡守,是太子治国的表现。第五章论述了太子学习礼仪文化的内容,根据弹、射、学商、学舞、田猎前的“裸”祭和进献玉璧仪式,推测子从事的这些活动,属于商代礼仪活动的范畴。该文从“子”为太子的观点,又引发出商代有无宗法制度和子为何人的问题,通过论证商代太子制度的内容,说明了商代晚期,已经有了宗法制度;子应当为武丁太子孝己。刘晓东《子产与春秋后期的政治变迁》(导师:晁福林教授)将子产置身于春秋历史的大背景下,在春秋政治变迁中把握其为政举措与观念,以期对子产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加深对春秋历史变迁的认识。该文以《左传》、《史记》以及其他文献中与子产有关的史料为基础,探讨子产与世卿政治的关系,分析子产的为政观

念及其在春秋战国为政观念演变过程中的地位与影响,以及后人对子产为政历史与思想的诠释。作者认为,世卿政治为子产登上政坛创造了条件,而子产的执政又使郑国的世卿政治得以稳定与发展。子产在执政中突出礼的地位,但又同时提升与加强刑罚的功能。子产在权力关系上表现出仁、惠的传统精神,但是在统治制度上通过作封洫、作丘赋、铸刑书却日渐显示出一种谨慎的变革意识,在为政观念上探索传统理念与政治现实的整合。因此,子产既非超然于世卿政治之外,又非单纯的保守者或变革者。马汝军《周代君位继承制度研究》(导师:晁福林教授)从周代君位继承制度的溯源、确立、实施、发展模式,以及周代君位继承制与国家进程、分封制度、宗法制度、婚姻制度的关系等方面,比较全面地讨论了周代君位继承制度,认为周代君位继承制度的实质是嫡长子继承制,从而否定了周代君位继承制度是选择继承制的说法。该文认为,周代君位继承制度是由夏商损益而来,但又有自己的特点。通过对鲁、宋、楚、晋、吴、赵、越等国君位继承制度的探讨,该文概括了三种不同的继承模式,即以“传子制”为主的“周代模式”、以“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为特点的“殷代模式”和特色独具的“土著模式”。不同模式继承制度发展的方向均归结为嫡长子继承。此外,作者还认为家庭关系与亲族关系的强弱是导致不同继承模式

的关键因素。分封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实施的外在保障。宗法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实施的内在保障。刘伟《〈国语〉思想研究》(导师:晁福林教授)认为,在承认“天”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国语》编者初步构建了一个天道——君王——人事的理论体系,并以君王为桥梁,促成了天与人在理论层面上的结合,而在具体实践中,《国语》主张以“和”为基本原则。在“为臣必臣,为君必君”的原则下,《国语》编者希望在君王的身边能出现更多的“良臣”。法制观念方面,《国语》编者倾向于重视并充分利用传统法律资源。战争观方面,《国语》编者虽然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但又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必然性,兵刑合一、礼法交融,是《国语》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国语》编者的家国一体意识已经淡化,并承认家国有别。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则应“大家”为主,兼顾“小家”。《国语》编者把礼乐变迁看作政治兴衰的晴雨表,提倡为政者加强对贵族子弟和民间社会的教化。总之,资政是《国语》编纂的主要意图。在一定意义上,《国语》中的不少篇章都可称得上是原始形态的家训、诫子书。《国语》之编纂,又有对民间社会进行教化的意味。重视传统、反思传统,使《国语》编者的政治观具备了厚重的思想积淀,而立足现实、服务当世,又使其政治构想具有可操作性。后晓荣《战国秦汉政区地理研究》(导师:晁福林教授)主要研究有关战国秦汉时期的政区地理问题。在材料上,利用战国秦汉时期各种文物中的历史地理资料,如各种金属铭文、玺印、封泥、碑刻、石刻、简牍、帛书、陶文、砖瓦文、漆器文,以及其他相关战国秦汉城址考古、出土地图等。在方法上,遵循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对“地下文献”收集整理、鉴真去伪的基础上,努力熔文物、地理、古文字、文献、城址考古等材料于一炉,开展具体

的战国秦汉政区地理的专题讨论。该文考实战国时期韩置县38、赵置县84、魏置县55、楚置县60、齐置县26、燕置都19,首次提出有秦一代置54郡,理清了新莽所置125郡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新莽历史地理研究,补充了《中国历史地理图集》中新莽地理之缺。该文在详尽认知和占有战国秦汉考古历史地理资料的基础上,以《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等文献为研究战国秦汉历史地理的主线,对战国秦汉郡县制进行考证和增补,探究其设置废迁,从而较清楚地展现了战国—秦—汉郡县发展情况的延续性,让人们对中国第一次有现代意义的行政区划地理的发展情况有一个较完整的认识。

两汉魏晋南北朝史:宋仁桃《汉晋时期道教的传播》(导师:何兹全、陈琳国教授)从汉末魏晋时期社会群体信道状况入手,分析不同社会群体信道心理、社会背景,道教在不同社会阶层传播的手段和原因,探究道教与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全文主体共分四章。第一章讨论道教的区域传播,认为巫鬼信仰风行的地区也正是道教传播盛行的地方。第二章讨论汉末魏晋时期的灾疫与道教在下层的传播,其传播的特点是口口相传。第三章讨论汉末魏晋时期道教在上层社会的传播,其传播特点是谈玄和写经。第四章讨论道教在妇女世界的传播,认为道教关于男女关系和妇女地位的较开明的思想,是道教在妇女世界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张耐冬《东魏北齐皇权政治研究》(导师:何兹全、陈琳国教授)认为东魏皇权政治的特色,是以霸府为政治核心、皇帝与皇权相分离、皇权政治由政治霸主(高氏)操纵。北齐政权的建立则使东魏时期皇帝与皇权相分离的状况得到了改善,二者出现了短暂的统一。但北齐的皇权依然受到军事实权派的干涉,加之北齐诸帝以残暴和荒淫著称,严重影响了皇权

政治的正常运行。作者认为,在东魏北齐的历史上,皇权政治的支持力量主要是勋贵与大族。勋贵是以追随高欢而建立军功的武人为主的阶层,他们通过出任国家高级官员、担任重要军事职务等方式辅佐高氏统治者,维持着皇权政治的运行。但随着东魏霸府转变为北齐朝廷,这一群体日渐衰落。大族则是以家族血统为标志的高门,他们以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与私家武装而成为东魏北齐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但因为统治阶层内部轻视汉人文士的风气影响,以及高氏巩固其家族统治的需要,汉人大族也受到了打击与限制。皇权政治的混乱无序,以及皇权政治的支持力量勋贵与大族的衰落,是北齐衰落与灭亡的重要原因。杨更兴《汉晋时期的益州方士大姓》(导师:曹文柱教授)主要研究汉晋时期益州地区发生了哪些政治变化;益州方士大姓在这种政治变化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种角色在当时的社会政治中起了什么作用;对其后的社会有怎样的影响;在当时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中,益州方士大姓自身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该文认为,益州方士大姓在刘焉、刘璋统治益州时期占有很大的优势地位。蜀汉时期其地位要低于荆州士大夫集团和原刘璋旧部。蜀汉灭亡之后,益州大姓的地位则进一步降低。东汉后期,巴蜀地区出现了一个稳定的研习今文经学的儒生群体。受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等传统的影响,巴蜀学者中产生了两个心结:一个是关于汉家的“厄运”之说,另一个是“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之说。蜀汉政权的建立和消亡使得巴蜀儒生的两个心结得到了完美解决。汉晋时期,新的历史环境促使益州大姓自身也不断发生着演变,这种演变的核心主要是为了适应即将出现的魏晋士族政治。与这种演变同时发生的还有士大夫群体中出现的名士化现象。刘小平《中古佛教寺院经济变迁研究》

(导师:曹文柱教授)以传世文献、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和石刻碑铭等史料为基础,借助历史学、宗教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古时期(3—9世纪)即汉唐时代的佛教寺院经济变迁及其与中古社会的互动予以论述。该文主要从中古佛教寺院的资源配置方式;寺院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均田制、《百丈清规》、度牒制度与寺院经济发展的关系;世俗王权社会对寺院经济的干预;佛道之争;以寺院为中心的社会空间和功能的变化等方面探讨其发展变迁。作者认为,中古佛教寺院经济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有来自外在的世俗社会的因素,也有佛教自身内在发展的原因。寺院经济的变迁及其与中古社会的密切互动,在中古时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历史意义。

隋唐五代史:冯金忠《唐代地方武官研究》(导师:黎虎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学界在武官研究中比较薄弱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第一,探讨唐代州郡地方武官,认为唐代地方武官由前期的都督、都护府下的军、守捉、城、镇、戍系统,转变为后期的节度使为代表的地方武官系统。第二,研究唐代藩镇储帅制度,认为唐代藩镇储帅可以分为使府僚佐储帅和世袭性的副大使储帅两种。第三,探讨唐后期藩镇武职僚佐的迁转,认为顺地藩镇武职僚佐与中央禁军间的流动是双向的、互动的,而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割据型藩镇的武职僚佐与朝廷间的流动是单向的。而藩镇之间的迁转流动可以分为藩镇军队调防引起的迁转流动和辟署制度引起的迁转流动两种类型。该文还以幽州镇为例,探讨了复合型藩镇内部武职僚佐的流动。第四,以将门为中心探讨唐代地方武官的世袭,认为唐初将门主要集中于禁军中。唐后期地方将门的分布既有几个传统地区如关内、陇右、幽燕,还出现了几个新地域,如河北(包

括中南部)、河南。河北道成为唐后期将门最为集中的地区。唐代将门分布的另一个特点是出现了在集中前提下的分散化现象。么振华《唐代自然灾害及其救济》(导师:施建中教授)通过统计得出,唐代290年中,累计发生水、旱、虫蝗等各种自然灾害657年次,可谓无年不灾。唐代灾害具有很强的联系性、持续性、周期性和广泛性,对唐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认为,出于对自然灾害的警惧心理,唐人进行了大量祈祷禳灾和弭灾之举以外,他们也会主动地与灾害开展抗争。国家的赈灾行为,主要包括灾前的预防措施、灾中的救援措施和灾后的恢复措施。唐朝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灾赈制度和较为完善的因灾蠲免程序。民间救灾方面,包括僧人的慈善救灾、悲田养病坊、个体家庭和家族对灾害的预防自救之举等,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救助不及时弊端。社会整体环境的好坏、官员个人素质及水平的高低、制度的制定和法规的良好执行,与救灾的效果密切相关。唐朝廷对自然灾害的赈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灾害并未在实质上危及唐朝统治与稳定。直至唐末,当时的旱蝗之灾也只是在唐朝政治统治已趋于瓦解情况之下,对亡唐起到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处于中国古代承上启下位置的唐代救灾,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非常深刻而富有启发意义的。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婚宦、迁移、家族文化为中心》(导师:施建中教授)就隋唐士族河东柳氏家族的发展、崛起、兴盛、衰亡过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全文围绕柳氏家族的世系、婚宦、迁移、家族文化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试图从中发现河东柳氏家族兴衰规律的特性。该文通过对河东柳氏世系的考证与分析,补正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缺漏之处。作者的研究表明,河东柳氏在唐代的发

展整体趋于平缓,仕宦情况与前朝相比,柳氏族人的仕宦品级有所降低,人物谱系较为模糊。婚姻关系中,与李唐皇室直到中晚唐依然有通婚的事例,与传统世家大族通婚的比例不高。归葬情况中,传统的归葬观念已经淡薄。族人的郡望与族属意识减弱,士族制度已经很松散。这使河东柳氏声名在外的除了唐初宰相柳奭等二十多人并居尚书省的显赫之外,最著名的就是其家族文化底蕴的深厚。其中以柳宗元、柳芳为代表。河东柳氏家族整体实力随着唐末士族的衰落而衰落,但其家族能继续维持声望不坠正是因其独特的家族文化。彭文峰《五代马楚政权研究》(导师:施建中教授)将马楚政权置于五代十国的历史大背景下,对马楚政权的发展历程、内政、外交以及经济、民族政策等进行了研究。从五代十国历史发展特征的角度对马楚历史进行了重新认识。该文认为,马楚政权由前后相继的马氏政权和后马楚政权构成。马楚统治集团经历了如下一个转变过程:蔡州军将集团——马氏家族集团——朗州土著集团,马楚政权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上述统治集团先后征服演变的历史。马楚政权在政治上藩镇体制、天策府体制长期并存,形成了双轨制的政治体制模式。外交上,事大政策是马楚处理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基本政策。向中原王朝进贡,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是事大政策的重要表现形式。对周边其他政权则采取了务实的外交方略。经济上,马楚经济发展的速度居同时期十国其余政权的前列,但统治者的奢侈腐化以及内争外战造成的损耗造成了马楚经济的迅速衰落。羁縻安抚是马楚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政策,溪州铜柱铭文集中反映了马楚统治溪州地区诸蛮的羁縻安抚思想,是元、明、清以来湘西地区延续数百年土司制度的滥觞。

明清史:李留文《13—19世纪中原的地

方精英——以河南济源为例》(导师:赵世瑜教授)以河南济源为例,探讨地方精英群体的演变。济源位于晋豫两省交界处,境内王屋山早在唐代就奠定了浓厚的道教传统。元代,国家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地方社会以社的方式组织起来,维持一种自然的状态。道士同社长等民间权威一起构成地方精英。明初道士势力衰落,耆老成为地方精英。明代晚期以后,绅士群体逐渐兴起成为地方社会的支配群体,官绅共治的权力格局最终形成。宗族一直到清前期还不为民众所接受,宗族组织也非常罕见,其普遍发展是在乾隆以后。宗族的发展首先是绅士群体兴起及其势力扩张的结果,下层绅士是宗族文化构建的主力军。其次,宗族的兴起还与雍乾时期顺庄法的推行有着密切关系。随着顺庄法的推行,村社被赋予了赋役征收的职责,于是宗族成为可以利用的文化工具,原有的村社以宗族为基础分化为若干个小社,所以社的分化过程同时也是宗族发展的过程。宗族的发展使绅士进一步获得了民众的文化认同,巩固了其作为地方精英的社会地位。由此,乡村社会在清中期开始出现重大的转型。王海燕《风水墙内外:清东陵的政治——社会史研究》(导师:赵世瑜教授)从社会史的视角,以中国第一历史馆藏的清宫档案为主,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和手段,通过对清东陵的研究,来探讨清代的陵寝制度在清王朝的历史上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如何扮演的问题,进而期望重新解读清王朝的政治和历史。清东陵是清朝入关后修建的第一座陵寝。清朝统治者为了管理好祖先的陵寝,在清东陵设置了很多机构,派宗室和官兵驻守看护,并制定各种禁令严密防卫。这反映出国家政治力量在陵寝这个特殊地方的强烈表现。作者认为,清东陵虽然是一个神秘的皇陵,但是它却离不开周边地方社会的供应。陵寝的修

建,也为居住在这一带的百姓提供了差役的机会,尤其到了晚清时期,陵寝大工,往往给附近商人、工匠带来了赚钱的机遇,这样就形成了风水墙内外互动的一个区域社会。总之,清朝统治者将宗法秩序、专制皇权以及帝国的永恒这些深层的东西,以静止(自然山川、风水理论、物态的建筑)和动态(丧葬、祭祀、谒陵等各种仪式的表演)的外在形式,通过皇陵这个帝国象征的舞台展演出来,起到了整合社会,维护统治的作用。邓庆平《州县与卫所:政区演变与华北边地的社会变迁——以明清蔚州为中心》(导师:赵世瑜教授)以蔚州在明清两朝的沿革情况为切入点,探讨其时华北边地的社会变迁。蔚州在明朝一直处于明蒙对峙的前沿,是重要的边塞军镇之一。在地方行政管理上,分割为蔚州与蔚州卫两套管理体系。蔚州与蔚州卫在基层组织、户籍管理、田赋征收等方面有着制度和实践上的明确区分,但是在各种地方事务中又表现出紧密的合作关系。清初朝廷裁改卫所,蔚州卫改为蔚县。改卫为县,对军户身份、基层组织、乡村关系及权力网络的变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蔚州与蔚县两套平行的政区也出现了辖境界限划分不清、资源配置矛盾重重、经济利益纠纷不断的复杂局面。因此,清政府重新调整政区,将蔚州与蔚县合并。与此同时,随着清朝北部边疆的拓展,蔚州也逐渐从边塞成为内地州县。从“边疆”到“内地”的地理位置变化与州——卫变迁的地方管理体制演变,造就了蔚州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可以看作华北边地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

(五)2007 届中国古代史博士论文共 14 篇:其中先秦史 3 篇,魏晋南北朝史 3 篇,隋唐史 5 篇,明清史 3 篇。

先秦史:全卫敏《〈商君书〉研究》(导师:晁福林教授)分别讨论《商君书》的成书时间

和该书所反映的制度和思想。作者参考古人对《庄子》“内”“外”“杂”之编辑体例,将《商君书》各篇分作内篇、外篇、杂篇三个层次。通过分篇考证,得出的看法是:今本《商君书》中的《画策》、《错法》、《徕民》、《赏刑》、《慎法》等五篇成书偏晚,是商鞅后学所作,属于外篇;《定分篇》内容驳杂,与商鞅及其后学的思想存在一定距离,属于杂篇;除此六篇外,绝大多数篇章集中反映了商鞅本人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商君书》中涉及的田制、爵制等相关制度以及其主导思想,认为《商君书》的理论基础是变易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尚公”和国家本位是全书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强调政胜为战胜之本是《商君书》军事思想的重要特征。张磊《周代司徒研究》(导师:晁福林教授)探讨了司徒的渊源,归纳了周代司徒的类别,分析了周代司徒的职掌,论述了司徒与西周社会分封、王室经济、军队的关系,概括了春秋战国司徒的一般情况,并以鲁国司徒作为典型进行了深入剖析,用历史发展的眼光考察了周代司徒地位的演变,考证了《周礼·地官》中关于司徒的记载的可靠程度。作者认为,周代司徒渊源于神职,和负责祭祀土神的后土有重要关系。司徒的不同执掌反映了不同的社会背景。春秋时期诸国司徒地位的提高同这一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动、赋税兵役制度的变化有重要关系。通过对《周礼·地官》中记载的司徒和周代司徒在职掌、地位和属官的比较,发现《周礼·地官》记载的司徒是基本可靠的,并可以从这个角度推测《周礼》的成书时代,大致在春秋战国之际。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周代司徒的类别、职掌和地位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周代社会的重要视角。张连伟《〈管子〉与先秦学术思潮》(导师:晁福林教授)在对《管子》文本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管子》与先秦学术思潮之间的

关联。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管子》的某些篇章入手,揭示《管子》与先秦学术思潮之间的联系,具体分析了《弟子职》与管子学派,《地员》与先秦齐国地理环境,《度地》与先秦齐国的水利堤防思想,《桓公问》与先秦的谏诤,《水地》与古代水文化,《小匡》与《国语·齐语》之间的关系;二是从《管子》书的整体出发,重点探讨了《管子》与《老子》、《国语·越语下》、帛书《黄帝四经》、上博简《恒先》以及《庄子》等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魏晋南北朝史:夏德美《南朝僧尼与佛教中国化》(导师:曹文柱教授)认为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既有理论层面上对印度佛教理论的选择和发展,也有行为层面上僧尼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具体行为方式的变化。该文基本上以后者为重点来展现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全文共分三篇。上篇主要探讨南朝僧尼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认为在孝亲问题上,南朝僧尼在理论上并没有超过印度佛教,但他们却通过自己的行动与传统伦理取得了妥协。在乡邑问题上,由于各种现实的原因,南朝僧尼与乡邑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中篇主要探讨南朝僧尼与南朝政权的关系。南朝统治者既利用佛教为其统治服务,又严格地将佛教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僧尼对统治者的态度在南朝时期日益复杂和明确,一方面僧尼在政治上取得更多的权力,越来越多的僧尼与政权发生联系;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僧尼有意表现对政治的疏离和清高。下篇主要探讨南朝僧尼与文化信仰方面的关系。首先探讨了佛教宗教方面的问题。主要分析僧尼与宗法性宗教、民间宗教和道教的关系,来展现佛教与中国本土宗教的冲突和融合。接着本文以僧尼素食和舍身这两个具体问题来展现宗教规范或神异性的行为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彭丰文《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导师:黎

黎虎教授)用个案研究与综合考察相结合,理论探讨与史实论证相结合的方式,对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的理论基础、历史背景、表现形式、形成因素、强化途径和历史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高度评价了两晋时期北方胡人统治者在儒学国家理论的传承与突破方面、在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方面的历史功绩,指出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的基本动向是突破与传承的高度统一,两晋时期的政治乱象并未造成社会心理严重撕裂与群体性对抗,政治上的各方分治仅仅是两晋时期的表象,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底蕴其实是基本一致的,并且明显展示出了进一步融合与趋同的倾向。付开镜《魏晋南北朝官员惩治与复起研究》(导师:黎虎教授)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惩治和被惩官员复起问题,是这一时期法制史、政治制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惩治官员的主要原因,政府惩治官员的基本依据、基本机构和皇帝、权臣、监察官员及其他官员在惩治官员中的地位等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官员惩治的决策程序、惩治决策的执行以及免黜官员复起的时间与职位等问题,认为在官员惩治的程序中,总的趋势是皇帝更多地处于主导和决策地位。而且,政府一般能较认真地执行惩治的决定,从而很好地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地位。官员的复起时间分为三种:短期复起(两年内),中期复起(两年到五年),长期复起(五年以上)。官员的复起职位也分为三种:同级复起,降级复起,升级复起。作者最后讨论了政府对官员惩治的双重效果和被惩官员复起对国家的双重作用,认为政治型惩治的破坏性极大,非政治型惩治积极意义较大;被惩官员复起缓和了社会矛盾,但不分官员犯罪轻重的复起与法律、监察制度相矛盾,破坏了法律的神圣地位。

隋唐史:董坤玉《唐代学官研究》(导师:

黎虎教授)认为学官制度作为官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交叉点,是制度史与教育史的重要内容。该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中国教育发展阶段进行了重新划分,以教育自身的成长状况为背景,将其分为孕育、成长、独立三个发展阶段。自西汉至隋唐是教育与政治紧密结合,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从隋唐时期开始,教育出现与政治相脱离的倾向,从此步入漫长的走向独立的历程。第二,肯定儒学自身的发展状况、科举制度与官学教育的不协调,是唐代官学衰落的直接作用因素,认为唐代统治者秉承少数民族血统,具有开放的体制,是官学衰落的一个重要背景。第三,考察了学官的贡献、作用,以及社会地位的转变。第四,探讨了唐代学官选用标准的变化以及迁转途径。第五,通过数据统计总结了唐代学官的地域分布情况。学官主要分布在东西、南北相交的两个地带。另外,本文还探讨了国子监的管理权限、分类探讨了旧士族在唐代的发展情况,宗室学官、学官世家,僧侣学官、军事家族的文武转变问题,以及各个阶层与科举的关系,展示了唐代学官群体的特点。乔凤岐《隋唐皇朝东征高丽研究》(导师:施建中教授)以隋唐皇朝东征高丽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从高丽的起源开始,讨论了高丽与汉唐时期中原各个皇朝的政治联系,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定位问题。隋朝和唐朝东征的军事活动,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其中涉及到隋唐皇朝的征兵和军队建制等制度性问题、隋唐两朝的粮草筹集与运输方式的异同,以及隋炀帝亲征高丽、唐太宗亲征高丽、唐军攻克百济、收复平壤等重要历史事件。隋唐东征高丽战争历时两朝近七十年,在战略战术的运用方面,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有几个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作者对正史中存在失误的个别问题作了考证。对于隋炀帝三征高丽和唐太宗亲征高丽

问题进行了比较性的探讨。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讨论隋唐皇朝历次征兵区域、粮草调配、行军路线等问题。此外,该文还以考古资料为主,探讨了高丽针对中原皇朝而修建的军事防御体系。宋军风《唐代商人若干问题研究》(导师:施建中教授)重点探讨了唐代商人经营状况与社会组织形式、唐代商人社会生活、唐代商人权利、唐代商人入仕等问题。作者认为,唐代商人坐贾为行与行商为纲的社会组织是在唐政府一手管制下形成的,是中国古代商人受控力度之强大的真切体现。在唐代商人的社会生活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阶层的差别与对立,随着他们经济势力的膨胀在各个方面多有僭越现象。唯独他们的信仰生活是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给他们留下的相对自由的精神空间。唐代商人在唐代中后期社会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而且商人凭其富多金帛,通过各种途径绕过铨选从而跻身仕途。但若细致考察唐代商人前后期所任官职,不难发现唐代商人所任官职由前期的非正员官逐渐向后期的正员职事官转化。唐王朝就在包括商人入仕的多种腐蚀剂的作用下走向了不归之路。石冬梅《唐代死刑研究》(导师:施建中教授)从唐代适用死刑的犯罪,唐代死刑犯罪的起诉、审判和复核,唐代死刑的减免、替代和缓刑,唐代死刑的执行四个方面来探讨研究唐代的死刑。任长义《唐代御史台研究》(导师:施建中教授)考察了唐代御史台的机构构成和职官系统,认为唐代御史台机构不但相当完整和系统,而且十分精简和科学。唐代御史台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负有监督百官,典正法度的重大职责。唐代对御史的选任和管理特别重视,选任御史注重从德、才、识等方面全面考虑,特别突出御史的职业精神——“御史魂”。唐朝政府实行以御史台为骨干,中书、门下的谏官系统和封驳系统相配合,三

者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监察体制;御史独立行使监察职责;地方监督实行监察御史和十道(后十五道)巡按御史相结合等等,都是唐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特点。唐代前期建立了一套严密完备的监察体制,充分发挥了御史台的检察和监察职能作用,这是唐朝出现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盛世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反之,唐代的繁荣昌盛也为唐代的监察制度发展与完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廷权威丧失殆尽,御史台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御史台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加速了国家权力失控,终致唐亡。

明清史:戴辉《元明大理地区的帝国构建与社会转型》(导师:赵世瑜教授)认为元明时期,大理地区经历了由土官统治下的军民兼理向卫所——府县体制下的军民户分立的地方管理体制演变。面对帝国构建力度的逐渐增大,大理社会自各级社会精英到普通民众都积极应对着这种体制的转变,中央王朝成为他们新的权力以及文化资源,这促使元明大理社会转型得以出现。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大理社会由地方王国向土官统治体制的建立。第二章论述明代军户体制以及外来军事移民对于大理社会的影响。大理土著在承担国家军事义务、赋役义务的同时成为帝国体制下的军户。第三章探讨里甲体制下以及相关的赋役体系的影响下,大理的土著居民逐渐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的演变过程。第四章论述社会精英所代表的大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大理地区从地方王国的畿辅之地向帝国构建下的大理府的演变,这是元明时期中央帝国大力拓展疆域,并进行帝国统治的背景下的产物。而地方固有的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同时也促进国家政策的调整。在这一意义上,帝国构建与区域社会的转型出现了交融。梁勇《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巴县客长制为中心》(导



师:赵世瑜教授)以巴县档案、族谱资料为主要材料,辅以田野调查,试图重构在不同时期、城乡社会的不同地点,移民社会发展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制度实施与地方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作者认为,客长是理解巴县移民社会发展的核心概念。该文通过对客长的任充资格、任免程序、客长职能的梳理,认为客长是由移民自发推选出来的,并经政府授权的地方基层管理人员。通过客长,国家将游离于保甲制度之外的人口纳入到了官方的统治范围之内,移民也因此完成了对国家所承担的各类义务。客长满足了国家、移民、土著等多方面的需求。因此,客长制在兴起不久之后,即被国家纳入吸收,与保甲制度一道构成了清中前期巴县地方社会的基层管理制度。客长制与白莲教兴起之后推行的团练制度,表现了制度与社会之间的二重关系,即制度的设计者能够把地方社会产生的制度纳入到既有的制度体系之内;而地方社会则可能把统一的制度改造为适应地方社会需求的制度。另外,由于城乡移民的人口规模、经济实力、社会影响的不同,移民社会的本地化过程在城乡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丁鹏勃《江西景德镇明代御窑研究》(导师:王冠英研究员)以江西景德镇明代御窑为研究对象,利用考古类型学的原理,同时结合明清瓷器大多有款的自身特点,采取按形制分类但不作具体型式分析的新方法对遗址、墓葬出土及传世的御窑瓷器进行了综合整理,对器型、纹饰、款识进行了分类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制作工艺和相关制度。该文第一章对御窑瓷器的器型进行了研究,首先按时间顺序概述了各个朝代的器型种类,并在每一类下总结了该器从早到晚的演变规律,以图为辅说明。第二章研究了御窑瓷器的纹饰,在全面概述各时代纹饰面貌之后,重点进行了龙纹、凤纹以及人物纹的研究。

第三章对御窑瓷器的款识展开综合研究,首先概述了各朝代款识的总体面貌,然后分年号、字铭、花纹款三类分别考察。第四章是制作工艺的研究,重点讨论了烧成工艺。该章首先介绍了御窑遗址出土的明代早期的葫芦形窑和中晚期的馒头形窑,阐明御窑从使用葫芦形窑转变到使用馒头形窑的必然性。然后进行窑炉分工的考证,认为燃横窑是烘焙低温釉的窑炉,而非以往认为的烘彩炉;色窑是烧制高温颜色釉的窑炉,而非以往认为的是烧造低温颜色釉的窑炉;风火窑是烧造半成品的窑炉,而非以往认为的是诸窑的总称。之后介绍了御窑遗址出土的窑具及其制作、使用和装烧方法。第五章论证了御器厂的设立时间,认为御器厂乃成祖于建文四年(1402)设立,然后对御窑的匠役制度作了详尽考证,之后探讨了解运过程及运输路线。结语部分将御窑的发展进程概括为五个阶段,并结合文献与上文研究成果试图恢复明代御窑的面貌。

(六)2008 届中国古代史博士论文共 19 篇,其中先秦史 4 篇,两汉魏晋南北朝史 5 篇,隋唐史 7 篇,宋史 1 篇,明清史 2 篇。

先秦史:徐庆丰《〈世本〉研究》(导师:晁福林教授)在目前公认为最佳的茆泮林、雷学淇辑本《世本》基础上,对《世本》佚文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研究,主要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为文献学的研究,包括对该书的流传、散佚、篇目的考证等内容。《古文四声韵》中载有一古文钞本的《世本》,并收录了该书的三个古文字体。通过和战国文字材料的对比,认为此《古世本》可能是存在的,并非杜撰。诸经史注疏中所引《世本》佚文差异的存在不是因为所据《世本》有多种别本,而是由于诸注疏的流传问题和引用者的不够谨慎等原因引起的。《世本》中有本纪、世家、传等篇名,见于孔颖达《左传正义》、《礼

记正义》等书所引,但这仅是出于征引的方便、比拟于《史记》纪传体而形成的称呼。

《世本》中有史表之说,更是失察前人引语所致。《世本》跟《史记》纪传体裁的创作没有太大关系。第二部分内容为《世本》的历史学研究。《世本》的内容很典型地反映了先秦社会的特点:族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单位,具体而言,就是从族到家的转变。该文认为《世本》的主体可能会成书于战国中期,具有对古老的并且是即将逝去的谱系知识的追记的性质。于薇《西周徙封与宗盟问题研究》(导师:晁福林教授)以西周封国政治中前人着力不多的两项研究内容——徙封与宗盟为题,将其作为分析西周政治的两个视角,从空间的横向角度与政治等级的纵向角度对西周封国加以梳理。该文分两编。上编为徙封问题研究,认为徙封既是周王朝巩固统治的需要,也是扩展疆域的手段。经过两百多年的分封和徙封,西周末年王朝封国呈现出一种区域性分布的格局。这种格局在地域上既有对氏族时代及晚商方国分布范围的继承,也受到西周王朝经略和开发的影响。这种区域性很强的封国结构凸显了西周政治中地缘因素的加强。下编为宗盟问题研究,认为“宗盟”就是“宗庙之盟”,是西周王朝治下的所有封国在周宗庙中举行的集会盟誓活动。宗盟以同姓、异姓和庶姓作为封国政治等级的划定标准,是西周初年对于封国关系的一种理想规划。西周封国的发展没有完全实现周初的宗盟规划,而宗盟作为一项制度也在西周中前期就废止了。但宗盟原则的影响则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宗盟规划的简单性、等级原则的单一性是宗盟未能很好实施的原因。文章最后认为,西周的徙封和宗盟,揭示出西周国家政治由应对挑战到自觉发展的轨迹,也反映了早期政治发展过程中血缘与地缘两因素之间的张力。王青《上博简

《曹沫之陈》研究》(导师:晁福林教授)分为两编。上编是《曹沫之陈》的疏证。该文在充分吸收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分简文、意译、备注、疏证四项对简文进行疏证。下编是《曹沫之陈》的成书年代、背景、性质、内容等问题的综合研究。作者认为《曹沫之陈》的底本成书年代很早,应当在春秋前期鲁庄公在位的年间,此篇最初可能是鲁国史官的记言笔录。《曹沫之陈》与先秦时期的“语”颇有关系。该文还从社会与学术两个方面论述《曹沫之陈》成书的背景,并且对曹沫其人进行考析,发现先秦历史人物的史事记载在流传过程中,往往经历着史官记载——口述史——史官再记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人会因音近而出现异名,其事可能会有所增益或失真。最后,作者试图从周代世风移易的角度对曹沫形象的转变进行再探讨。在尚“文”世风下产生的熟稔礼仪的军事家曹沫,在战国时期“尚武”风气之下,被演绎成为功成名就的刺客典范。了解曹沫这个历史人物形象转变的深层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曹沫之陈》的成书问题。郑立跃《中国古代政治盟约从盟主体制下到帝国体制下的变迁》(导师:何兹全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盟约,在春秋时代进入其典型形态,战国以降,产生了巨大的转变,随即又在汉帝国的产生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春秋时代,政治盟约承担着维系诸侯国家共同体的功能。通过政治盟约,若干政治原理从诸侯国家的具体关系中被提炼出来,成为了盟主体制的基本原则。在战国时期,春秋类型的诸侯国家关系不复存在,而政治盟约在此时重新又有了具体化和私人化的关系。在国与国之间的盟约信誉下降时,此类私人交际之中重信义、盟约的因素得到激发。在反秦战争中,基于任侠和盟约精神的双重基础,大量的地域集团得以产生、联合,并对反秦战争

与楚汉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汉帝国建立后,以“白马之盟”将延续自反秦与楚汉战争的具体君臣关系转化为基于抽象原则的新君臣关系。在汉朝廷与诸侯王、汉与周边政权的问题上,政治盟约也被广泛利用。新莽末和东汉末的动乱中,政治盟约再次显著地出现,然而其主张的原则,已经深深地带有帝国体制的影子。

两汉魏晋南北朝史:党超《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考察》(导师:王子今教授)认为两汉风俗观念具有比较鲜明的政治文化特性。该文首先探讨了汉以前的风俗观念,认为其为两汉风俗观念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接下来,作者探讨两汉风俗观念在政府统治思想变迁中的演进轨迹,认为随着两汉政府统治思想的变迁,诸子风俗观念在其影响下不断发展演变。同时,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两汉诸子的风俗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地对政府统治思想施加自己的影响。在汉代,风俗观念既有与社会政治的良性互动,又有对社会政治思想的反动。两汉统治者则通过各种措施,对风俗进行探讨、引导、批评,以求齐整风俗,实现对社会文化的软控制。该文最后探讨了兩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特性及历史价值,认为两汉时期所形成的传统风俗观念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深远影响。刘志平《〈焦氏易林〉的历史学考察》(导师:王子今教授)认为《焦氏易林》一书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该书不仅受到儒学精神与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又蕴含着其他丰富的社会思想;不仅是一面反映西汉经济的明镜,又是一支描绘西汉社会生活多彩画卷的妙笔。作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焦氏易林》作综合性的历史学考察。首先,论述《焦氏易林》的两大文化主题,即儒学精神和道家思想,以及其蕴含的其他社会思想,包括神灵与鬼怪信仰、数术思想、祥瑞灾异思想、生

态意识、民族意识等。其次,从经济史角度考察《焦氏易林》。从《焦氏易林》透视西汉的整体经济状况,考察其记载的西汉经济政策及体现的经济思想。再次,从社会生活史角度考察《焦氏易林》,对其反映的饮食、医疗卫生保健、婚姻、服饰等风俗;记载的虎狼之患;行旅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史信息(如“以头戴物”的生活习俗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而对《焦氏易林》描绘的社会生活画卷进行全方位的论述。李世萍《郑玄〈毛诗笺〉研究》(导师:汝企和教授)认为《毛诗笺》在注释学、校勘学乃至思想方面都取得了很高成就,堪称《诗经》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注释成就。郑玄以毛诗为主,采纳三家诗说,对毛诗序多加注释,一般遵序说诗;广泛采用引经注释法,显出极大的包容性和权威性;比毛传更加细密地标兴释兴,借助兴义的阐发注入儒家的伦理道德,并对兴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其整体具有以今释古、以礼笺《诗》、感时伤世等特点,呈现出繁简得当的注释风格。其二,校勘成就。郑玄本着严谨求实、择善而从、不刊改旧文、从今字的校勘原则,对毛诗进行了大量的校勘。他运用他校和理校的校勘方法,集中校勘名物、礼制,往往指出致误原因。其校勘对清代理校学派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其三,《毛诗笺》体现出丰富而复杂的思想。其中突出反映了郑玄的德治思想;阴阳及阴阳和谐思想;引用讖纬或解说经义,或说明灾异符瑞、帝王感生等。这些既融入了汉代的学术思潮,也体现了先秦儒家思想之精华,同时也是郑玄间接批判现实、警戒君王的重要手段。《毛诗笺》借鉴了先秦诗解方法,继承并超越师法,弘扬了孔子的教化思想,使其笺注具有经世致用功能。郑玄通过采用三家诗说、引经注释法和引纬说诗等,使今古文融合为一,形成了《诗》学的“小统一”,对后代诗

学影响深远。朱林芳《北魏至隋唐北方汉世族权势转移问题研究》(导师:曹文柱教授)认为经过汉魏的发展,建立在乡里宗族基础上的世族“君居一方”,享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权。永嘉乱后,在北方局势混乱的情况下,世族除对中央政权进行政治上渗透外,还在地方上行使了政府的部分职能,维持一方安定。在北魏建国之后,世族以中央与地方“双家”形态出现,乡里的宗族势力对世族权势的维持起了决定性作用。但由于皇权的加强,世族的权势开始出现转移。该文以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为对象,探讨他们墓葬地由乡里逐渐转向都城的过程,从而说明世族在地方上的权势逐渐消失。与之同时,皇权的加强使世族凭借门第在中央累世任官的优势逐渐丧失,选官制度和选官标准向着更有利于中央权力的方向发展,这使得失去乡里支持的世族更加依赖中央,逐渐成为政府肌体中的一分子。在这个过程中,世族政治地位表面上得到了极大提高,实际上却标志着他们已越来越处在政治权势的边缘位置了。洪卫中《政权的变迁与士人命运的跌宕起伏——南北朝时期后三国入北南方士人研究》(导师:曹文柱教授)对南北朝后三国时期,因侯景之乱而入北的南方士人进行研究,认为他们对南、北政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人才流失导致南方文化发展的延缓,另一方面,人才到来客观上促进了北方文化的兴盛。就这些士人本身来说,入北却是一种艰难而痛苦的过程。他们不得不审时度势,转变观念,谨慎地周旋在北朝政权之下。他们为北朝社会的文化与典章制度的创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进而影响着隋唐文化的繁荣。该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重点阐述梁末士人入北的原因和背景。第二部分主要从文化视角来看这些入北南方士人。主要论述了在南北文化交流的背景下,

南方士人入北的作用、他们自身的生存状况。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了后三国时期南方士人入北后的心理意识及其变化,以及他们在北方与统治者之间的互动。这是该文的重点。第四部分简明论述了入隋后的梁末入北士人的仕宦活动和因陈亡而入北的南方士人仕宦活动,以期通过比较,较完整地探究这些新旧南方士人入北以后在北朝的生存状态。

隋唐史:孙军辉《唐代民间信仰研究》(导师:何兹全教授)认为,唐代的民间信仰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从民间信仰角度了解唐代传统社会和普通百姓生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该文分四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介绍交通鬼神的中介——巫,认为唐代巫觋的交往群体囊括了整个社会阶层。唐代社会巫觋观念的盛行,不仅是前代社会文化意识的沿续,还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民众面临众多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关系。第二部分对唐代的鬼神信仰进行研究。主要论述唐代灵魂观的盛行及各种鬼神、灵异信仰,以及这些观念、信仰存在的原因、具体表现和社会意义。第三部分论证了唐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占卜之风,认为唐人的占卜生活与其他信仰观念一样都充满实用性,利则行,不利则禳。第四部分探讨唐代民间信仰的特点和现实存在意义。主要从《元和郡县图志》一书来探讨了唐代民间信仰的特点,认为在某些意义上讲,民间信仰的盛行不仅仅是某种社会心理暗示,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救灾自助活动,是整个社会整体意识、社会意志的体现。村井恭子《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唐朝北边政策研究》(导师:黎虎教授)认为,唐代历史的辉煌印象是侧重于安史乱前的情况或文化方面而言的。因为安史乱后蒙古高原的回鹘和青藏高原的吐蕃同时兴起,唐的势力仅存于东亚东南部。换言之,从乱后到回鹘汗国灭亡(840年)前的时期,东亚形势

以回鹘、吐蕃、唐这三国为中心展开。唐政府为了挽救衰落的局面,在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安史之乱前后,东亚国际局势有很大的变化,因此在唐朝采取的众多措施中,该文侧重于其北边政策。作者认为,安史之乱引起了唐前期北边管理体制的崩溃,但唐朝仍然保持羁縻州的政策,并对管理办法加以改变,以防备外部势力。该文即试图考察在东亚国际社会中权势逐渐衰落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唐朝针对北边地区采取的政策和相关制度上的变化。客洪刚《唐代皇室刺史研究——以皇子出刺为中心》(导师:施建中教授)考察唐代皇室出任地方的现象,认为唐代的皇室刺史分布明显呈现以京师为中心,由密至疏,逐渐向外展开的态势。朝廷也经常任命宗室成员出任那些处于军事要地、经济发展条件优越的州郡刺史。从整体上看,皇室成员出任刺史所及州郡多少与唐朝对地方控制强弱成正比关系。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中央牢牢控制地方,大量皇室成员出任地方刺史,并实际赴任,所及州郡众多;后期藩镇林立,甚至有不少藩镇脱离中央的控制,皇室刺史出任地方刺史的人数和概率大大减少,且多为遥领。从整体时间分布上看,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人数、人次和所及州郡呈现马鞍型,太宗、高宗时期和玄宗时期是两个高峰期。唐代皇室刺史与朝廷政局变动联系紧密,大体呈现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围绕皇权、帝位展开。二是在朝廷政局发生重大变动或存在重大争斗之时,皇室刺史乘机起兵或发动政变。三是多采用政变方式进行。张洁《两唐书〈酷吏传〉研究——以武则天时期为中心》(导师:施建中教授)认为武则天为了代唐建周并巩固政权,起用了一批地位低下的酷吏,将他们安置在三法司机构,利用他们推鞠治狱,剪除政敌。酷吏创造发明的罗织理论和

治狱实践相结合,成为武则天时期酷吏的一个显著特色。武则天之后,酷吏现象断断续续,唐玄宗时期曾经掀起过酷吏肆虐的又一高潮。肃宗之后酷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新唐书·酷吏传》直言贞观时期无酷吏。但贞观治世时期,也存在酷吏虐民的现象。安史之乱以后,虽然酷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依然停留在唐后期的政治舞台上,对唐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两唐书《酷吏传》不仅是两唐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酷吏传》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唐朝官修史书垄断局面形成以后,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大力张扬儒家传统的仁义道德,自《新唐书》之后,《酷吏传》逐渐消失。赵英华《唐前期东宫官研究(公元618年—713年)》(导师:施建中教授)以公元618—713年的唐前期历史为断限,以唐前期东宫官员的设置和皇储及唐前期政局变动间的密切联系为切入点,探讨了唐前期东宫官的机构组成、唐前期各朝东宫官的嬗变和唐前期东宫官员的选任标准和来源等问题。作者结合史籍,对唐前期曾担任东宫官员的人物进行了爬梳整理,并总结出了唐前期选拔东宫官员的标准。认为,唐代建立了以皇储为核心的、机构比较庞大、内部分工比较细密的东宫官体系,是中古时期东宫官规模最为完善的时期,符合“如一小朝廷”之喻。从唐前期东宫官员设置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出东宫官员的增省和太子势力的强弱及政局的演变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唐前期东宫官员的每一次增省都是随着太子或政局的异动而相应发生改变。东宫官同皇储间除了一荣俱荣,休戚相关的关系外,还有一种逐渐疏离的趋势。也就是说从巩固皇权角度来看,唐代东宫官由辅弼两宫,开始向遵从于皇权的趋势发展。朴天伸《8至9世纪“在唐新罗人”在黄海海上的交易活动》(导师:宁欣教授)广泛运用

中韩日史籍,深入研究9世纪的在唐新罗人及其所进行的海上贸易活动。该文主体共分六章。第一章全盘考察了在唐新罗人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生活情况,以及在唐新罗人社会的管理机构。第二章从多个角度谈论了从8世纪后期到9世纪前期,利用黄海展开的东亚三国之间的活跃的海上交易活动的背景。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官方贸易逐渐衰退、民间贸易活动积极展开的8—9世纪的东亚三国的贸易管理机构。第四章具体分析了9世纪东亚贸易的主角——张保皋和在唐新罗人的活动。第五章重新考察史书对东亚航线的记载,论证8—9世纪东亚贸易活动所利用的航线。第六章分析了清海镇废止以后9世纪后期东亚贸易出现的新的变化。该文认为8—9世纪,以张保皋为中心的在唐新罗人的海上贸易活动不仅带来了东亚国际秩序的稳定,而且也对东亚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活跃起了重要作用。张春兰《唐代都城管理若干问题研究》(导师:宁欣教授)研究唐代都城管理涉及的若干问题,即唐代都城管理的机构及法律法规、人口管理、治安管理与唐宋之际都城管理的变革等,力图对唐代都城管理的制度、内容、特点及变化有较为全面的总结。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追溯唐以前的城市发展与管理状况,并分析影响唐代城市尤其是都城发展及管理的因素。第二章介绍负责唐代都城管理的机构及与唐代城市管理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唐代都城管理的机构分为行政管理机构和具体职能机构两类,而《唐律疏议》中关于城市管理的立法意义重大。第三章总结唐代都城人口管理的策略:以户籍为标准分类管理与以坊、市、街为标准分区管理相结合。第四章列举唐代都城治安管理组织系统,概括唐代都城治安管理的特点。第五章分析由唐入宋都城管理的变革。入宋以后,城市社会进行了重新组合,都城管

理面临新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与挑战,北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的管理措施,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城市生活的管理由严格控制转向宽容引导;新的管理区划出现,都城行政区划由三级转为四级;城市居民的职业构成更加多元,突破“四民分业”的界限;城市公共娱乐活动场所从无到有,纳入政府的管理范围。

宋史:刘云军《两宋时期东岳祭祀与信仰》(导师:游彪教授)认为与前代相比,宋代东岳祭祀与信仰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两宋时期,在都城修建五方岳镇海渎坛,这是前代所无的举动。东岳信仰在宋代出现了全国性分布的趋势。宋代东岳庙会比较繁盛,打诨是庙会上一项受人欢迎的娱乐活动。泰山香社组织在宋代已经出现,但仍处于发展、完善阶段。宋代社会各阶层对东岳信仰存在不同的态度。帝王将其视作政治统治象征、社稷保护神。士人对其态度比较复杂。他们一方面接受儒家经典话语,认同东岳信仰中的国家意识,反对任何形式的神灵越界。另一方面,面对东岳信仰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性信仰的现实,多数士人试图用东岳神的有效性来解释神灵越界。他们有意识地用国家意识来改造地方民众的东岳信仰,试图建立一个符合国家利益的道德秩序。普通民众对东岳的信仰建立在东岳作为山川自然神调节气候的能力之上,同时对其治鬼、保境安民的神力更为着迷。南宋以来,东岳神转化为“地方保护神”。宋人相信东岳神可以审理世间无法申诉的冤屈,因而与东岳神的交流并不需要通过某种中介媒体。朝山进香、朝献、个人祈祷,是宋人与东岳神交流的惯常渠道。在东岳神司法审判中,诉讼过程变得更加简化,诉讼时间更短,符合了宋人理想中的司法模式。东岳神与宋人之间交流既不是单纯的“官僚模式”,也不是“个人模式”,而是呈现一种二

者混合体的复式结构。

明清史:薛立芳《毛奇龄“诗”学研究》(导师:晁福林教授)对清初学者毛奇龄的“诗”学作了系统的整理与研究,从诗总论与诗三百篇的具体研究两方面重新探讨其价值。全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探讨毛奇龄对诗总论问题的研究。主要讨论了毛奇龄在《诗序》作者、风、雅、颂的意义,对宋学的批判,对“笙诗”无辞说的批驳等问题上的相关成就。下编讨论了毛奇龄的两部诗学著作《国风省篇》及《毛诗写官记》,在《国风省篇》的研究中逐篇考论了毛奇龄对《国风》中的十五首诗的诗旨解说,通过比较研究以及具体考证研究分析了毛奇龄诗说的创新之处以及论证不足之失。在《毛诗写官记》的研究中则从经学与文学角度有所选择地考察了毛奇龄所论诗篇十九首,并对其诗说观点一一作了评析。丁慧倩《从家族到族群:明清北方散杂居回回人社会组织变迁研究》(导师:赵世瑜教授)以北方散杂居回民为研究对象,以山东青州、河北沧州和山西长治三个地区的回民聚居为个案,力图通过对明清以

来回回人家族化过程的揭示,探讨回回群体在历史上存在的组织形式,以及回回族群产生的历史过程。该文分别以户籍制度对回回族群的影响以及回回人从家族到族群的演变轨迹为内外两条线索,共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介绍上述三个个案地区回民聚居区的空间分布和回民居住形态。第二章到第四章依此介绍青州、沧州、长治三个个案。该文对每个个案的描述均采取历时性的手法,围绕上述内外两条主线展开,通过将清真寺内部管理结构的变化以及区域性祖先移民故事的形成等问题融入其中,力图把握每个地域社会里回民聚居区出现、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过程。第五章综合前文内容,从时空两个角度对北方散杂居回民聚居区的发展历程做综合性的对比论述。通过考察,作者认为明代回回人从家族到家族间的整合,地域性共同体的逐渐形成,其时间不早于清代,尤其是在清中后期受新疆、西北政治形势和群体内部社会关系变化的影响,内部认同与外部边界日益明显,家族逐渐走向族群。

## 楚地出土战国简册研究》介评

郭永秉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由项目首席科学家陈伟教授主编的“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楚地出土战国简册研究》(下简称《研究》)最近已由武汉大学出版

社出版。《研究》是一套十册专著组成的丛书,分别是陈伟《新出楚简研读》、丁四新《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陈仁仁《战国竹书〈周易〉研究》、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虞万里《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研